

社会理论(第1 辑)

苏国勋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理论(第1辑) / 苏国勋主编, 渠敬东、张旅平副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2
ISBN 7 - 80190 - 857 - 0

. 社... . 苏... 渠... 张... . 社会学 - 研究 .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733 号

社会理论(第1辑)

主 编 / 苏国勋
副 主 编 / 渠敬东 张旅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易 之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名人时代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16.75
字 数 / 288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857 - 0/D · 260
定 价 / 32.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会理论》发刊辞

从最初的《社会学参考资料》到后来的《国外社会学》再到今天的《社会理论》，本刊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春秋，见证了中国社会学恢复、发展和壮大的各个历程。甚至可以说，本刊的每一次变化和自我提升，不仅体现而且实实在在地建构着中国社会学的这一蓬勃发展的历史。

今天，社会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的学术的变革背景中：第一，在学术界，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社会学转向于当下已蔚为大观，从社会学角度思考社会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已成为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选择。这种转向不仅标志着社会学理念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同时也是社会学同其他学科逐渐接近的表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以自我滋养是当代社会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源泉。第二，与上述转向相呼应的是，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综合化趋向日益彰显。在当代理论界，不同学者的研究对象选择已经很难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围划分进行明确界定，它们之间有的只是视角和方法论的差异，而较少具体研究对象的鲜明分割。因此，大凡以社会关怀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大家，都很难被归入传统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等某一单一的学术头衔之下。故而，与其将他们的学说用某一既成的但不具有概括性的学科概念来冠名，不如称之为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社会理论”更为妥帖。第三，20世纪末以来，整个世界的历史处在一种全新的变局之中：冷战结束、网络社会凸显、全球主义与本土化之间剧烈冲突……人类社会的前景动荡不定、扑朔迷离，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种变局和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当前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课题。第四，中国社会同样正处在历史上少有的大变革时代，其动力一方面来自本土内部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则被裹挟在整个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与这一变革步骤基本上是同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的积累，中国的社会学正逐步走向成熟，中国社会学构建具有原创性的本土性理论的时机也正在到来。

本刊从《国外社会学》改版为《社会理论》，不仅是对上述学术和社会趋向的呼应，同时更是为研究或者顺应上述趋势建构一个有效的学术平

台的具体表现。因此，这次改版，不仅仅是刊名的变更，也是办刊宗旨的调整：第一，本刊的选题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社会学领域，而放眼于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有符合以“社会生活和人类行动的文化产物”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思考都将被纳入本刊的视域，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具有跨学科视野的理论园地。第二，不再局限于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工作，而是在继续评介国外各种社会学理论、深入了解世界社会理论最新潮流的同时，更侧重刊登中国两岸三地学者以国外社会理论为参照来探讨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经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文章，以鼓励和催生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关注中国本土社会发展的理论努力，竭力推动中国社会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不断深化和成熟。第三，是故，本刊虽取名为《社会理论》，但其触角绝非简单地停留于象牙塔内，而是将其根基深刻地扎入到实践关怀的肥沃土壤之中，不仅谋求对世界社会和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论理解和解释，而且谋求对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的深度反思。惟其如此，本刊的学术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彰显，其生命力和学术活力才能得以保持和不断激发。

值此改版发刊之际，谨以上述寄语告白于学界，一则竭诚欢迎海内外学界同仁不吝赐稿，共襄此举；再则作为一种自我期许或鞭策愿与社会学界同仁共勉。是所盼焉，谨记。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合作 新机制的生成

李友梅

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同时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强化和相互依存的社会转型（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2001），它改变着人类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时空结构（有社会学家称之为“世界压缩”），它预示着一个以新的规则重新组织全球社会的设想，因而会不断出现带着各种决策实施企图的行动者。如果这里的判断是可取的，人们可以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人类合作新机制形成的过程，想走进这样的过程，首先需要深刻认识和理解这样一些问题：全球化本身的原动力是什么？具体行动空间的合作机制和社会秩序将如何被协调？这个协调的有效性所依赖的条件以及参与者建构“游戏规则”所依赖的权力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一些讨论，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如何与处在全球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不同力量建立合作框架提供一些启发。

—

其实，自霍布斯以来，人类合作机制与社会秩序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学家使用的规范、制度、组织、网络、体系、结构等典型的社会分析性概念无不与人类社会的整合相联系，这些术语的提出和成熟无不蕴涵着社会学家把握社会秩序的努力。在社会学家看来，任何一个维持人类合作的秩序，其目的都在于协调人的行为（Douglass North, Douglass C. North, 1990）。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类合作机制的研究，最初基本上

罗伯森揭示了文化、社会以及其他一些要素是怎样结合在一起并促进互动增加的，他把这种状态称之为“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参见杨雪冬（2002）。

是沿着亚当·斯密的思路展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用“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描述了人是如何被“引导推进某个并不在他意图之中的目标”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看到了市场作用的促使者的某种理性计算，以及这种理性计算对某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兴趣所在。

随着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大企业为了使这个发展趋势符合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就需要扩大它们的自主空间并确立它们的垄断地位，因此，出现了大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这一创新在经济学家看来，如同采用新技术、使用新原料和开辟新市场一样，是一种再造新结构的战略行动。但这种创新的行动逻辑并非只是经济的，而更多是属于工业逻辑（J. 熊彼特，1934；胡光代、厉以宁，1982）。经过对大企业组织系统内革新问题的深入考察，社会学家发现，这里发生的任何革新行动都可能是一种企图，革新不仅仅是一个取决于经济理性的个别现象，也是一个取决于复杂体系的集体现象，实际上，革新的成功必须要依赖整个组织系统内部权力活动的深刻变化（M. Crozier，1970）。在组织社会学的视野里，市场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也是一种决策机制。按照帕森斯的看法，市场更是一个社会交往的体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市场是社会构造的产物，它必须借助于经验机制，才能最终使得各方参与者的原创性、行为和行动趋于协调。这些分析表明，在深层结构上，所有社会层面的变迁无不蕴涵着人类合作机制的转换与生成。

与市场化同步跟进的后工业化更进一步推进了新合作机制的生成。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工业社会主要是建立在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相结合的基础上的，其市场遵循的是“商务”逻辑；后工业社会主要建立在高工艺与服务相结合的基础上，其市场遵循的是“服务”逻辑。“商务”逻辑更注重数量和相同性，而“服务”逻辑更追求质量和差异性（M. Crozier，1989）。伴随“后工业社会来临”的是与全球化紧密联系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这个网络社会是一个围绕全球性的资本、文化、信息而组织起来的，可以无限扩展的系统，具有高度开放性、弹性和多重性。它不单纯是人与人、个人与组织、个体与社会沟通的中介，同时也形塑着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而也构建着新的权力来源、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时空认同，为人们开创了一个可以运用新的合作

这里所涉及的网络是曼纽尔·卡斯特视野中的网络，这种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构成的，而节点的涵义则由具体涉及的网络种类决定。比如，在全球金融网络中，节点就是股票交换市场及其辅助性的服务中心；在欧盟政治网络中，节点就是部长会议与欧洲委员会。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曼纽尔·卡斯特（2001）。

机制的理想场域。

社会运作逻辑的这几次转换，实际上表明了人类合作机制所基于的关系纽带和标准、组织动员的策略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进一步分化，更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这个分化，人们看到了通过法规和法则建立起来的行为规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合法性，并且越来越被“市场力量与原创性的自由发挥”（米歇尔·克罗齐埃，1986）所取代。人们因此推论：在作为交往场域的市场里，以利益交换为主要机制的交易性权力将逐渐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机制的再分配权力。

二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家似乎处于失去政府权威的境地，西方社会似乎也成了—个缺乏规则或者说规则普遍失效的社会。这些现象在一些人看来，与自由主义的胜利、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日趋弱化有着密切联系，有人因此提出了回到自由主义思想，同时消除官僚主义规则的观点。这种观点指出了人们关于社会组织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强调要以更灵活的方式来重新考虑社会生活的管理。

可是，随着英、美国家所奉行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中遇到了困难，人们开始领悟到：消除官僚主义规则并不足以保证自主的原创性在“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中或通过“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得到迅速扩展；凡是以协调人类行动为目的的任何形式，都不可能是纯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市场也不例外，市场本身也是社会构造的产物，它的运行甚至需要相当程度的组织才能得以维持。由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回到自由主义不仅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带来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于是提出了市场规则也有局限性的观点。这个观点指出了市场秩序不可能是简单的无意识的结果，也不可能是没有规则或缺乏规则强制的结果（E. Friedberg, 1997）。

上述两种观点告诉人们，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方世界里，政府和市场都失灵了。有人把这种现象视为“有组织的无秩序”，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说，这里产生的问题涉及到—系列“合法性危机”，因此需要进行权力再生产，从“统治”逻辑转向“治理”逻辑，使合作机制基于横向的、互惠的关系之上。

有集体生活经验的人们多少会有这样的体会：人类关系和社会交互作

用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而且始终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性，因此这个整体的正常运行要依赖其成员行为的协调性。从某种角度看，协调的过程就是组织的过程，组织的程度甚至有可能决定协调的效率。事实上，人们在相互协调中会创建一种结构，以使他们的行动能在这一结构中施展，行动受到结构的制约和限制便会呈现出秩序。但这个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组织在运行中总会生出一些带有偶然性特征的机会或空间。组织的成员也总是有可能通过某种行动对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进而促成新的秩序，而这个新秩序不是原先那个秩序的复制。也就是说，行动空间中的秩序不是可以简单还原的，而是在合作机制的变迁中不断再生产的。

这些可变性的存在不仅意味着行动是基于战略考虑的，而且还意味着行动者的出场或退场不是可以自由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社会行动者的合作空间与合作模式进行任何“预设”都会碰到问题，因为设计者不可能完全知道这种向着无限的未来开放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只有从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出发，才能有效地认识行动领域的运行方式，才能有效地把握这种运行方式的原动力和实际意义。如果人们把这些讨论延伸到全球化背景之下，人们或许会发现人类合作的时间和空间结构都相对化了，于是还会感到自己手里有的概念工具对于分析和理解这里所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太有限了。

三

自由主义理论和官僚主义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合作机制的协调过程中形式秩序与规则的变迁，前者强调“自生自发”的秩序，后者注重精确预设的规则。在这场持久的争论中，他们主要聚焦于这样一个话题：自由市场与官僚体系，在协调人的行为中究竟何者更有效率，以及这种效率的来源何在。在这些关于把握人类合作机制的讨论中，一个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人们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在这两种机制之间作出抉择，换种方式说，就是社会转型乃至全球化进程本身的原创性的动力来源的问题。从之后的研究发现中，我们进一步注意到，

比如，威廉姆森的一项富有创见的研究就试图指出，市场与官僚制度都是有效整合资源、协调人类合作关系的重要手段，不过两者在不同场合（他称之为“交易”）中的效能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已有的关于自由主义与官僚制规则效度的大讨论似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的：评估与使用规则的人们具有一个完全中立、合乎规范理性、无特殊偏好、无特殊依附状态的态度。不过，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发生学的层面直接指向了人类合作机制中深层次的权力运动，或者说，这种提问方法洞穿了“形式官僚制规则与市场自由秩序何者更为合理”的表层争议。它更进一步地促使人们思考：合理性自身被建构的逻辑是什么？在这样的思考下，人们或者可以意识到，在市场自由秩序与官僚制规则之下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权力秩序，它对于人类合作的协调发挥着系统的调节作用。

这种深层次的权力秩序是相对于哪一个空间而言的呢，它到底是怎样运动的呢，它的合法性基础又是什么呢？对于上述问题，现代政治学提出了一种“治理”的分析框架，并强调基于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横向沟通。这样的一种研究取向在两个方面给出了启发性的思路：一是合法性不是恒定的，而是在沟通中建构的；二是在复杂的合作过程中，秩序的稳定性产生于多种规则遵循者的协商过程。概括地说，在“治理”的视野下，秩序的生成所基于的权力依赖关系是非常复杂而且具有偶然性的。不过，“治理”的分析框架并没有提供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工具，因而研究者难以看清这种权力关系的性质和运行路径。在这方面，社会学的组织决策分析发现了另一种权力的来源，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这种权力来源产生于不同行动者的权力关系过程，该过程是围绕削弱或控制某个自由余地的“游戏”而展开的。由此，人们看到了行动者世界更深层的活力，也得以观察“有组织的无序”现象中的内在秩序。

存在于这样的行动空间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参与者既可能成为支配者，也可能处于被支配地位，支配者与被支配者是可能变换的。因此，这种秩序里的权力始终是在过程中的权力。

从这种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合作新机制的生成，人们可能会作出这样的提问：全球化是否从一开始就涉及了一些行动者的某些企图？其实，许多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现，一些居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和组织试图通过全球化，将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及惯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为自己发展出一种新的自主空间，进而实现一种新的集权。但同时，人们也或多或少地觉察到，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合作并不存在一个永恒的主导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组织，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使自身在其中能够占据有利位置的权力秩序，就不仅要使自己能够优先运用影响环境变化的有效对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自己有能力在“权力游戏”中成为关键的行动者。

有关内容可参见 E. Friedberg (1997)；米歇尔·克罗齐埃 (2002)；米歇尔·克罗齐埃 (1989)。

在这种场景下，人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由市场能够控制的领域，不再是由官僚体制可以控制的领域，也不再是由传统的共同体可以控制的领域，而是由处于互动中的那些行动者的特殊经验构成的复杂体系，这里出现的任何合作都充满着具有特别含义的风险和机遇。

四

人类合作机制是如此的复杂和丰富多彩，对于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有效合作的建立需要借助一系列的能力，比如重构权力来源的能力、构造合法性基础的能力、影响变化趋势的能力等，而这一系列能力的获得要求人们用更新的思维方式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强调新的思维方式和高水平的学习能力，是因为人们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往往会试图扩增自己的自主性，而这个扩增需要动用一个或多个自由余地，由此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各种行动者的出场或退场。为了能够在合作中占据有利的方位，并能够支配关系局面，行动者必然会有创建新权力来源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参与者固守自身的权力运作模式，不善于创建或借助新的合作规则，就难以成为行动领域的主导者，更难以成为该领域的权力关系规则的主要建构者，说不定还会被这种权力关系规则所左右。因此，人们要在合作过程中构建顺应自己的秩序，就必须深刻思考如何扩大自己的自主范围。

新的权力秩序需要获得合法性基础，由于这种合法性基础只能在相关行动者之间的“权力游戏”中建立，它的有效建成需要依赖相关行动者之间达成的认同，而这些认同只能产生于他们之间的某种协商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个人或群体试图通过官僚体系中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或试图通过市场机制中“自生自发”的权力秩序，来使其在“权力游戏”中的行为获得合法性基础都会使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化，从而也会有可能使自己卷入“权力游戏”的迷宫而失去方向。因此，对于“权力游戏”的参与者和建构者而言，创建并使用一种协商机制或者说一种权力关系来获得其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是他们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

从更深层次上看，上述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需要行动者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使自己有条件去深入理解和分析行动领域提出的复杂问题。当然，从“权力游戏”的过程看，行动者如果想使自己成为其中的关键角色，他们还需要另一些能力的支持，比如对行动环境中的潜规则及其变化方式做出及时而有效判断的能力，对微观行为及其所基

于的思想方式的感悟能力，在多种利益中构建结合点的能力，限定他人处境和改变他人对策的能力，为自己扩展更多自主性的能力，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实现能力更新”不仅仅是一个通过建构一些新的制度安排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求人们从对规则自身的设计转向对合作系统运行逻辑的分析，倘若人们总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人们的策略行为所遵循的思想方式没有摆脱“路径依赖”影响的话，那么他们也就难以有效提升必要的行动能力。

在这种思维脉络中，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也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使那些被认为是这个过程的引领者的人也要有认识这个转型所具有的特殊逻辑的自觉性，同时还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

作者系上海高校社会学 E -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栗 洵

参考文献

- J. 熊彼特，1934，《经济发展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
- 胡光代、厉以宁等，1982，《当代资产阶级经济主要流派》，北京，商务印书馆。
-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2001，《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曼纽尔·卡斯特，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米歇尔·克罗齐埃，1986，《论法国变革之路——法令改变不了社会》，程小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米歇尔·克罗齐埃，1989，《被封锁的社会》，狄玉明、刘培龙译，商务印书馆。
- ，2002，《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杨雪冬，2002，《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Douglass North, Douglass C. North,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 Friedberg, 1997, *Le pouvoir et la règ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M. Crozier, 1970, *La société bloquée*, Editions du Seuil.
- ，1989, *L'entreprise à l'épreuve: apprendre le management post-industriel*, InterEditions, Paris.

特洛尔奇学述与现代性问题的关联

刘小枫

一 特洛尔奇生平及学术述略

特洛尔奇 (Ernst Peter Wilhelm Troeltsch) 1865 年生于德国奥格斯堡的一个医生家庭。其父母对自然科学和文化史的浓厚兴趣、当地开放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是特洛尔奇的心灵成长史中值得提到的两个影响因素。中学毕业后，特洛尔奇服过一年兵役，先在奥格斯堡念了两学期哲学，随后游学爱尔兰根大学 (师从 W. Bousset)、柏林大学 (师从 J. Kagan 和 AD. Wagner)、歌廷根大学 (师从 A. Ritschl, 1822 ~1889) 等，主修哲学和新教神学。

1891 年，特洛尔奇以博士论文《论 Gerhard 和 Melanchton 的理性和启示概念：早期新教神学史研究》获教会史 - 教义史讲师资格。大学期间，特洛尔奇对新兴人文学科 (尤其近代哲学和史学) 兴趣浓厚，深感知识理论的现代进展与基督教传统信仰形成的新的历史冲突日倾激烈。在博士论文中，特洛尔奇探讨了 16 ~17 世纪早期新教文化与 18 世纪启蒙文化的差异，敏锐地看出，早期新教思想与中古神学思想在品质上相当一致，都是一统性的权威式宗教文化，现代性的真正开端是 18 世纪的启蒙文化和法国大革命，而非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时代的新教思想实际上相当保守，其传人一直抵制启蒙后的自由新教思想。

特洛尔奇先在 Bonn 大学当了两年编外讲师，讲授系统神学。1894 年，年仅 29 岁的特洛尔奇受聘为海德堡大学系统神学教授，六年后又同时执掌

哲学系的教席。其时正值德意志帝国晚期的现代化政制变革时期，以新教自由派人士的学者身份，特洛尔奇发表了大量哲学、神学、宗教理论、社会理论和思想史方面的论著，与哲学家文德尔班（W. Windelband）、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法学家吉利纳克（G. Jellinek）建立了亲密友谊，亦与当时知识界的重要学者滕尼斯（F. Tönnies）、松巴特（W. Sombart）、西美尔（G. Simmel）、迈纳克（F. Meinecke）等交往密切，在德国大学制度和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改革中十分活跃，对现代德国学术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一度成为政制变革中的政治人物。1908年，当时的学界泰斗狄尔泰（W. Dilthey）邀请特洛尔奇到柏林大学哲学系接替包尔森（Friedrich Paulsen）的教席，该校神学系也邀请他去执教，其学术声望如日中天。

在海德堡大学执教11年，特洛尔奇首先致力于审理近代以来的哲学、史学、心理学对基督教的批判，想搞清近代以来基督教信仰面临的困难，重新考虑神学的认识论问题。主要论著有：《康德宗教哲学中的历史方面》、《宗教学中的心理学与认识论》等。通过把握近代科学和哲学思想提出的新问题，特洛尔奇看到，近代以来，基督教信仰面临的根本难题是历史思想的冲击，而不仅是无神论一类思想主张或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冲击。“历史给信仰造成的难题，几乎远甚于现代形而上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给信仰造成的难题。历史给现代生活真正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庄严的问题，像现代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从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历史思想对基督教的冲击，首先是对基督教信仰的绝对性构成的挑战，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对此作出的反应并没有让基督教解脱历史主义的纠缠。为此，在著名的《基督教的绝对性与宗教历史》一书中，特洛尔奇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提案。

特洛尔奇的生平，参见 F. W. Grag/H. Rüdiger, Ernst Troeltsch Bibliographie 《特洛尔奇生平》，Tübingen, 1982；H. - G. Drescher, Ernst Troeltsch: Bibliographie und Werk 《特洛尔奇：生平与著作》，Göttingen, 1991；其思想发展脉络，参见 H. - G. Drescher, 《特洛尔奇的思想历程》，见 J. P. Clayton 编 Ernst Troeltsch and the Future of Theology 《特洛尔奇与神学的未来》，London, 1976，第3~32页。

Ernst Troeltsch, Das Historische in Kants Religionsphilosophie, Berlin, 1904；Psychologie und Erkenntnistheorie in der Religionswissenschaf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Kantischen Religionslehre für die heutige Religionswissenschaft, Tübingen, 1905, 1922 第二版。

特洛尔奇：《信仰与历史》，见特洛尔奇《神话与逻各斯之间》，刘小枫编，朱雁冰、刘宗坤等译，香港道风书社，1998，第271页（以下凡引此书仅随文注页码）。

Ernst Troeltsch, Die Absolutheit des Christentum und die Religionsgeschichte, Tübingen 1902 / München 1969 / Gütersloh 1985, T. Rendtorff, 导论版（中译本将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

随后，受韦伯影响，特洛尔奇开始关注基督教与现代世界形成的思想史关联。

基督教思想有丰富的传统，从现代社会理论的问题意识审理这一思想传统，是特洛尔奇在海德堡时期的又一重大学术成就——《基督教会及社团的社会学说》。这部近千页的论著实际是基督教的社会思想史论，力图搞清“基督教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在现代的停滞，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学意义上的制约，它本身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具有积极创造性的社会学原则”。书中的内容基本上是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材料，但特洛尔奇不是从教义学原则、而是从社会学原则来看待这些材料。哈纳克已经依现代的历史文献学原则重述教义史，建立了文献学式的教义思想史论述典范，其《教义史》堪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基督教思想史的开山之作。但在特洛尔奇看来，哈纳克的《教义史》仍然是单纯的教义史，没有从现代问题出发，已经失去时代意义。特洛尔奇的这部思想史从现代性问题出发，而非历史文献的梳理、整编。文献家式的教义史经典不乏后来者（如当今的帕利肯），人们总会等到机会说它老了、过时了。特洛尔奇的思想家式的基督教思想史至今没有超越者，现在还没有人敢说它过时了。

把握现代世界的形成是个很大的题目，与这部鸿篇巨制有关，特洛尔奇还写了《近代的新教基督教及其教会》、《新教对现代世界出现的意义》、《奥古斯丁：基督教的古代和中世纪》。

从现代性问题意识出发，不仅单纯的教义史失去了时代触觉，单纯的教义学也失去了时代触觉。协调信仰与知识的现代冲突、基督教信仰与现代世俗精神的时代冲突，需要建构一种综合性的基督教理论，使基督教神学在现代经验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等主流文化构成的思想学术语境中具有沟通能力。为此，特洛尔奇撰写了有关神学方法论、神学基本理论以及基督教的社会理论、思想史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论文，多收入《论宗教境况、宗教哲学和伦理学》。

Ernst Troeltsch, 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 文集卷一, Tübingen 1912 / Aalen 1977, 第六版。中译本《基督教社会思想史》（香港基督教文艺版, 1960, 1988, 第四版）是该书的节译，除正文有删节外，极为重要、几近占全书一半篇幅的注释被全部删去。

特洛尔奇：《关于我的著述》，见特洛尔奇《神话与逻各斯之间》，前揭，第400页。

Ernst Troeltsch, Protestantisches Christentum und Kirche in der Neuzeit, Berlin, 1906 / 1922, 第二版；Die Bedeutung des Protestantismus für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Welt, München, 1911 / 1963, 第三版；Augustin: die christliche Antike und das Mittelalter, München, 1915。

Ernst Troeltsch, Zur religiösen Lage, Religionsphilosophie und Ethik, 文集卷二, Tübingen 1913 / 1981, 第四版。

1915 年，特洛尔奇从海德堡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当时，普鲁士的路德宗保守派仍然势力不小，普鲁士文化部为了不得罪反感自由派新教思想的路德宗保守派，批准给特洛尔奇的教授头衔是“文化、历史、社会哲学及基督教史教授”。到帝国首都后，特洛尔奇参加政治活动更多，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的民主化和政党政治的形成展开各种活动。特洛尔奇不仅是德国自由派神学家、哲学家、思想史家，也是德国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思想家。

海德堡时期的特洛尔奇学术，关注的明显都是与现代性有关的问题。理解“现代现象”(Moderne)的“出现及其问题，不仅构成了特洛尔奇全部著作的出发点，而且构成了其全部著作一贯的关节点和内在中心”。为了理解现代现象，特洛尔奇清理社会和思想的历史脉络，找出现代性问题的关节，提出解决的构想。特洛尔奇看到，现代性问题的要害是统一的文化价值不复存在，只有历史相对的伦理原则开始支配人类的行为和生活秩序。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统一的文化价值”就是基督教会的伦理，为了搞清楚它的兴衰，特洛尔奇撰写了巨著《基督教会及社团的社会学说》及其相关论著。“统一的文化价值”衰落以后，出现了各种历史相对的价值诉求，这是近代史学和历史哲学兴盛的根本原因。特洛尔奇的学术感觉敏锐把握到，历史思想乃当今神学界和人文-社会理论关注的诸多现代性问题的肇事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承接尼采思想的余绪，从所谓谱系学的历史研究入手，激发起新一轮重估价值的历史批判——历史主义的进程至今没有终止。

到柏林后，特洛尔奇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又有重大的推进：着手审理

参 G. Schmidt, Deutscher Historismus und der Übergang zu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Untersuchungen zu den politischen Gedanken von Meinecke-Troeltsch-Max Weber 《德国历史主义与议会民主制的过渡：迈纳克、特洛尔奇、韦伯的政治思想研究》，Lubeck/Hamburg, 1964；C. Kollmann, Eine Diagno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E. Troeltschs politische Anschauungen, HZ 182 (1956)。

特洛尔奇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著主要有：Religion und Wirtschaft 《宗教与经济》，Vor-traege der Gehe-Stiftung zu Dresden, Bd. 5, 1913；Deutscher Geist und Westeuropa: Gesammelte kulturpolitische Aufsätze und Reden 《德意志精神与西欧》，Tübingen 1925/Aalen 1966 第二版；Politische Ethik und Christentum 《政治伦理与基督教》，Göttingen 1904 和 Aufsätze über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und die Weltpolitik 《德国革命与世界政治论集》，Tübingen 1924 等。Egbert Stolz, Die Interpretation der modernen Welt bei Ernst Troeltsch: die Problematik der Neuzeit und Säkularisierung 《特洛尔奇对现代世界的解释：近代和世俗化的问题性》，Hamburg, 1979, 第 114 页。参 W. Kohler, Gedanken Troeltschs 《特洛尔奇的思想》，Tübingen 1941, 第 17 页以下。

近代以来的历史主义思想。巨著《历史主义及其问题，卷一：历史哲学的逻辑问题》可以看作《基督教会及社团的社会学说》的续篇，考察基督教会的伦理（欧洲统一的文化价值）衰落后历史理论的兴起过程：《基督教会及社团的社会学说》从初代教会时期写到18世纪，《历史主义及其问题》则从18世纪开始讲起。这部论著主要清理历史主义的思想发展，没有涉及如何克服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及其问题》原拟两卷，第二卷从更长程的思想史角度摸索历史主义的形成，但特洛尔奇生前未能完成出版，由H. Baron编成“特洛尔奇文集”卷四《思想史及宗教社会学论集》。清理基督教会伦理的兴衰和历史主义的兴盛并提出解决的构想，是特洛尔奇对20世纪学术最主要的贡献。《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没有回答历史主义引出的问题将如何解决，但特洛尔奇显然已经有大致的想法，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临逝前在伦敦作的讲演《克服历史主义》中获知其大概。

1923年，特洛尔奇因感冒引起的肺呼吸栓塞猝然而逝。哈纳克(A. V. Harnack)在葬礼演说中称：特洛尔奇“无可争议地是当代德意志的史学哲学家，是黑格尔以后德国曾拥有过的最伟大的史学哲学家……他把理念学和社会学（作为史学）这两大思想域结合起来了”。将特洛尔奇与黑格尔相提并论，不仅因为“历史哲学家”这个称号在当时的学术界意味着最有力度的思想，而且因为，调和历史主义与先验主义的矛盾，是黑格尔看到的现代性思想的艰难使命，特洛尔奇的思想顽强地承负起这一使命。

哈纳克没有首先称誉特洛尔奇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特洛尔奇究竟应该算作史学哲学家、思想史家，还是神学家？

Ernst 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1 Buch, *Das logische Problem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文集卷三, Tübingen 1922 / Aalen 1977 第三版。

Ernst Troeltsch, *Aufsätze zur Geistesgeschichte und Religionssoziologie*, 文集卷四, Tübingen 1925 / Aalen 1981 第三版。

Ernst 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Überwindung: Fünf Vorträge* 《历史主义及其克服》，Berlin 1924 / 1979 第三版（英文原书名是 *Christian Thought: Its History and Application*，德文版书名显然更恰切）。中译见特洛尔奇《克服历史主义》，刘小枫编，吴伯凡、纪琨译，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Adolf von Harnack, 《特洛尔奇的葬礼演辞》，见 A. v. Harnack, *Erforschtes und Erlebtes: Reden und Aufsätze* 《探索与经历：演辞与论文》，Giessen, 1923, 第367页。特洛尔奇去世后对特洛尔奇作出评价的其他德国重要的思想家还有：哲学家 M. Scheler, *Ernst Troeltsch als Soziologe*, In: *Koln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Soziologie* (1923 / 1924)；社会学家 T. Tönnies, *Troeltsch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Schmollers Jahrbuch* 1925；历史学家 F. Meinecke, *Ernst Troeltsch und das Problem des Historismus: Staat und Persönlichkeit* 1933；神学家 P. Tillich, *Ernst Troeltsch*, In: *Kant-Studien* XXIX (1924)。

基督教的统一价值的分崩离析伴随着欧洲学术体制的重大变化，过去占支配地位的神学逐渐被新兴的人文科学取代，神学领域不断收缩，新兴的人文科学不断分化（扩展）、专业化，并没有形成一种能够为生活世界提供统一的伦理系统的文化。在这种学术状况下，出现了两类不同的神学家。一类不妨称为“教会性”神学家，他们仍然思考和论说习传的教义学和释经学论题，尽管也从时代的思想文化处境出发，但思想方式和论述形式没有改变，仍然是教义学式的；另一类可称为“综合性”神学家，这类神学家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引入习传的教义学和释经学论题，改变了习传的神学思想和论述的方法和结构，出入现代学科领域，谈论世俗的知识和社会问题。施莱尔马赫是这类综合性现代神学家的第一位大师，其对于浪漫哲学以及文人化思想的贡献，并不亚于其神学思想上的贡献。施莱尔马赫以来，综合性的神学大家，恐怕非特洛尔奇莫属，且迄今无出其右者——文化综合（Kultursynthese）正是特洛尔奇的学术理想。如果把能够涵摄时代的学术进展的神学看作现代神学思想的重大推进，特洛尔奇的神学思想堪称现代神学思想最重要的扩建：不仅对近代史学的思想挑战作出了强健的神学反应，而且参与了社会理论这门现代学术的建设，发展出具有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问题意识的神学理论。如果要关注现代哲学（尤其历史哲学和认识论问题）、史学（尤其思想史和文化史）、社会理论（尤其知识社会学）、政治理论（尤其自然法学说），都无法绕过特洛尔奇的著述。

特洛尔奇一直被人文学界仅仅看作一个神学家，对其思想和学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神学界占支配地位的保守主义神学抵制特洛尔奇的自由神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特洛尔奇身后的学术声誉一直不彰是可以想像的事。晚近十年多来，“后现代理论”出场，重审“现代性”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的迫切课题，特洛尔奇的学术又日益受到欧美学界的关注。

搞清楚特洛尔奇如何将一门传统的信仰学术转化为一种现代的人文-社会理论，涉及如何让传统的伦理理论及其学术系统与现代生活世界协调

参 F. Wilhelm Graf/H. Rüdiger, E. Troeltsch: Geschichtsphilosophie in praktischer Absicht, In: Josef Speck Grundprobleme der grossen Philosophen: Philosophie der Neuzeit IV, Göttingen, 1986, 第 148 ~156 页。

参 JJ. Schaag, Geschichte und Begriff: Eine Kritische Studie zur Geschichtsmethodologie von Ernst Troeltsch und Max Weber 《历史与概念：对特洛尔奇和韦伯的历史学方法论的批判研究》，Tübingen, 1946；H. Bosse, Marx-Weber-Troeltsch: Religionssoziologie und marxistische Ideologiekritik 《马克思、韦伯、特洛尔奇：宗教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München, 1971。